

中国近代

新词语谈薮

钟少华 著

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

钟少华 著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 / 钟少华著. —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06. 4
ISBN 7-5600-5469-2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汉语—新词语—研究—近代 IV. H1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5681 号

出 版 人: 李朋义

责任编辑: 宋晓晖

封面设计: 牛茜茜

出版发行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(100089)

网 址: <http://www.fltrp.com>

印 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875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600-5469-2

定 价: 17.90 元

* * *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

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

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: (010)88817519

序

何九盈

上世纪50年代我读大一的时候，朱家玉老师为我们讲授“民间文学”一课，朱老师曾受业于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，论辈分钟先生是我的太老师。1957年，朱老师永远离开人世，太老师也沦落尘埃。四十余年间，由于工作单位不同，专业不同，我无缘亲炙于钟先生门下。想不到，1999年6月我第一次有机会拜见素所景仰的钟老先生。这年先生的一位博士生举行毕业论文答辩会，我应先生的邀请忝任答辩委员会主席。会上，先生惠赠大著《民俗学概论》，毛笔题字，下款注云：“时年九七。”以97岁高龄还指导博士生，而且思维清晰，语言简洁，文字流畅，恐怕并世无二。我向先生请教长寿秘诀，先生说了两个字：淡泊。

淡泊，古人写作“澹泊”“澹薄”，本作“澹怕”。今人对“淡泊”的理解就是“不追求名利”，而古人认为“非澹泊无以明德”，“非澹泊无以明志”。诸葛亮诫子云：“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；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”原来淡泊是一种境界，是一种德性，可以延年益寿，也可以“广才”“成学”。先生的令嗣少华君能传淡泊家风，疏远名利，学业有成。

少华有今日的学术成就，是他真正进入了淡泊境界，养成了淡泊德性。他的学术道路并非坦途，青年时代因受父母牵连，又遭逢十年动乱，坎坷复坎坷，岁月多蹉跎。张载《西铭》说：“贫贱

忧戚，庸玉汝于成也。”这中间的逻辑关系，用少华自己的话来表述，就是“感觉像是被置之死地，必须自己主动寻找知识，学习知识，掌握知识”。“寻找”“学习”“掌握”的是知识，而不是别的什么，我以为这正是古人所谓的“明志”与“明德”。作为一个人，既无“志”又无“德”，也就不可与言“淡泊”了。淡泊的是名利，进取的是知识。少华将知识加工为学问，转化为思想、为个人独特的见解，“说自己想说的话”，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，已发表论著多部。最近，又将出版《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》，命我作序文一篇，我与少华父子交知有年，不敢以不文推辞。于是我放下手头工作，费时二十余日，将集中 13 篇论文细细读了一遍。

写序言是苦事，细读却是乐事。乐在哪里，请听我慢慢说来。

我以半内行半外行的水平，穿行于“新词语”的密林之中，看少华挑战权威，向权威较劲，的确很开心。学术界就缺乏这种认理不认人的直性子，读这样的说言直论，乐在其中。

挑战、较劲，与鲁莽狂妄有天渊之别。后者是无知，前者是以求真为目标，以材料为依据，以天性为动力。笔之所向，锋芒显露，旁征博引，条条材料有如千军万马，层层展开，四面合围，必欲置论敌于无可辩驳之地而后快。少华虽能征善战，也会有自己的弱点与不足。古往今来，还没有一个人敢说，自己讲的句句是真理。但我敢说，在“新词语”这块研究领域里，就材料的掌握而言，少华是当之无愧的权威。他握有的某些材料就连国家图书馆也竟告阙如。他那不多的工资有相当一部分就花在搜求材料上了。对名利“淡泊”，对学问可不“淡泊”呀。我以为，只有这样的人，才配谈学问，才能真正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学问家。在这个以空谈为理论，以吹嘘为能事的年代，少华这样的学术人才，应当受到必要的关注。我乐意作此序文，这也是理由之一。

本论集所说的“新词语”，主要是指“近代新词语”，是指从清末至民初出现的“新词语”。这类词语的研究，国内外已有不少论著，切入点并不一样。有人从语言接触入手，有人从跨文化对话入手，有人从社会转型入手，有人从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入手。少华与众不同，他是从工具书入手，“是以近代中文辞书中出现的条目为重点介绍对象”。“而如果具体做，就是将我们民族的中文关键词语在近代约二百年间所产生的源头、所嬗变的主要痕迹，加以基本的排队清理，编成一部中国还缺乏的新类型的词语辞书，比如叫做《新辞源》就可以用了。”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，以个人之力——无论是财力、精力，都难以实现，这个工作是应该由国家出面当作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来实现的。这项工程的意义是多方面的，少华在不同的文章中有所论述。在讨论“百科全书”这个定义时，他深有感触地说：

总之，百年时光，一个民族对一个专用名词说过够多的定义，但总是不够准确，看来是非不能也，实似不为也。为什么似不为呢？如果去问那些历年下定义的人，恐怕问题更复杂，更不清楚。笔者认为，关键在民族文化素质。写的人，马马虎虎去写；读的人，马马虎虎去读，还互相传抄……

正是大家都“马马虎虎”，所以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“百科全书”条目就不够准确。该条目说：“百科全书概念是在20世纪才传到中国的。”少华指出，19世纪末康有为的《日本书目志》就大谈“百科全书”了。

一个“新词语”的产生、嬗变，往往反映了一门新兴学科的成长、发展过程。如“哲学”“科学哲学”这类名词，已为人所熟知，

但这类词语与学科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它们有着什么样的演变过程呢？为了清理这两个概念和反映这两个概念的“新词语”，少华以前专门写了《清末从日本传来的哲学研究》（《世界哲学杂志》2002 增刊）、《论清末的科学哲学》（《中国哲学》第十八辑），用丰富的历史资料，展示它们的来龙去脉，并通过个别概念的考察触摸到了中国文化的前进与倒退。因此，“新词语”的研究已不只是词汇史、文化史层面的问题了，而是进入到政治史、思想史的研究领域。词语是反映政治、反映思想的最好见证。少华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，所下的功夫，证明他不只是一个“语言虫”，而是一条“语言龙”。这类文字给人启发尤多，读这类文字真是赏心乐事。且看他在这两篇文章中的一段议论：

明朝末年顺利的交流，遇上亡国之灾，更因新统治者的封建闭关政策，二百年之后，17 世纪初进来的科学与哲学，在 19 世纪中期的中国人头脑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反倒是充满更多的与社会生产无关的所谓中国“理学”。当 19 世纪的西方科学哲学以全新的内涵，并躲在枪炮技艺的后面再来到中国时，搞得中国人莫名其妙，花费几十年时间，经过许多知识分子的努力，将本来颇为难懂的概念，搞得更加复杂，更加难懂。对我们民族来说，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。甚至大量词句流传至今，依然难以学习和协调运用。（《论清末的科学哲学》，《中国哲学》第十八辑）

由“新词语”的清理引发的文化思考、民族积习的思考，是少华思想的闪光之处。

思考之一,晚清末年中日双方都向西方取经,为什么日本成效显著,而中方却免不了落后挨打呢?这就涉及对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重新认识,这个口号是对还是错?少华指出:

当清末开始要学习科学时,是与哲学分开来学的。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思维哲学是属于“中学”,是“体”的一部分,可以放心使用。因此一大批哲学书和科学书传进中国,介绍关于科学的哲学方法,或者是哲学的科学方法,肯定难坏了当时的中国读者,他们很难了解和利用这些人类智慧之宝。而近代日本则不然,他们在明治维新开始时就“体”“用”不分地学习西方新知识,因此没有什么困惑于哲学和科学之间,他们毫不拘束地利用哲学的科学方法,去解决他们的“体和用”的困难。此事实,今天还有认识的必要,也许科学哲学正是中国进步的现代工具也说不定。((《论清末的科学哲学》,《中国哲学》第十八辑)

他在另一个地方也指出:

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,就是中国人学习现代化的思想、方法与步骤,曾经一连串失误,这是必须正视与总结的。例如在洋务运动之初,在中国大内战刚刚结束,洋务派就有经济实力创建大工业工厂,简直可以说是企图用钱来买一个现代化。虽然当时的口号是“以夷制夷”,而其实是“以华制华”。……将西方文明切成两类的引进方法与过程,已经造成中国的巨大伤害。仅取得取消科举制的措施,而人才则已推迟几十年产生。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在

吸收现代化概念、方法、措施等大关键变革上高明得很，但终比中国先进且付诸实行。

少华的意见可以概括为，中国洋务运动的权贵们，只想学新技术，不想换旧脑筋。技术维新，脑筋维旧。其实，现代化的关键是要换脑筋，脑筋不现代化，其余都是白搭。

思考之二，儒学能否救中国。整部近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回答，儒学不能救中国。而某些象牙塔里的书生，既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，又对儒学的种种弊端及其对近代中国所造成的危害缺乏起码的认识。他们只是超现实地玩弄概念，自以为儒学是振兴中华的法宝，是复兴东方文明的法宝。儒学当然还有自身的价值，也应该有人下工夫去研究。真正懂得儒学的人不是多了，而是少得可怜。那些以谈儒学为己任的人，有几个通读过十三经？有几人精研过汉学、理学？有几人联系历史、联系社会、联系实际对儒学的盛衰之理作出过中肯的理论化的诠释？又有几人将儒学与西方的哲学、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进行过切实的比较研究？儒学的地位在学术史上思想史上是不可轻视的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儒学永远是中国的宝贵财富，而它无力救中国，这也是不可轻视的事实。无论是近代中国、现代中国，还是当代中国，儒学都不是主流学术。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，从总体来看，弊大于利。少华的研究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可信的历史依据。他将“经世思想与百科思想”进行了对比研究，所得结论如下：

“经世家变法新机之破灭，满清政权最后之机固已从此丧失。而中国二千年儒家经国济世之政术，亦至于气运俱

尽。”(王尔敏语)经世之学终于不能“经世”和“救世”,恰是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决定了的,儒家不能救近代中国。

百科全书系列自始则承担了启蒙任务,它以比较准确的文字来解释条目中的新知识,这就使读者获得新的清楚的概念,从而知道当代各方面的情况,使现实世界与具体个人间的距离拉近,同时也令人眼界开阔,达到提高民族文化修养这个不一定是预设的目的。(《词语的知惠》导言,贵州教育出版社,2000年)

本论集中少华还多次提及,张之洞主持学部时,反对京师大学堂筹办哲学科,用“经学”取而代之,“但是中国新知识分子追求哲学的宏大气势已经形成,不可阻挡了”。

“经学”与“哲学”的较量,以“经学”失败而告终,这是时代潮流使然,非任何个人可得而逆转也。“经世思想”敌不过“百科思想”,道理亦在于此。“经世思想”与“百科思想”是两个特定的概念,有特定的历史内容,少华有自己的论述,读者可阅相关原作。

思考之三,少华在清理“新词语”的过程中,在清理清末民初工具书的过程中,有时“真是苦不堪言”。为什么?无人关注基本的资料建设。与邻国日本相比,弗如远甚。有的原始资料“失踪”了;有的资料沦为“废纸”;有的资料虽在,却无人整理,难以查找使用;也有将国家资料变成小团体发财手段,高价借阅。他认为:“还有一个现代中国文化的缺陷,就是对于历史资料的轻视。”以中国近代图书总目录为例,“即反映1840年到1949年出版的全部中文图书,从来没有个人或集体或国家汇编过,这是我们国家

民族的遗憾。我们生活在电脑时代,却缺少基本的实在的很有用的资料,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明程度的缺陷”。另外,“清末的哲学、清末的社会科学、清末的人文科学书籍,就从来没有中国人全部清理过”。

对近代文化资料、学术资料的轻视,反映近代学术的独立性和近代学术在国家的地位均存在问题。学术发展缺少内在联系和持久的继承性。一个政权跨了,一个时代过去了,一个时代的学术也就随风而逝。不断地破旧立新,大破大立,否定多于肯定,这对于学术文化发展非常有害。学术依附政治,这是学术的大不幸。诺贝尔奖迟迟不降临中国,怪谁!?

少华对“创新”与“守旧”的思考,也是由近代学术界轻视资料引发而来。他的批评是正确的:“百年至今的文化基础建设还远没有打好,就又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摘一个掉一个。”我很赞同下面这种看法:

守旧并非只能是坏事,旧而能够守,就说明有这个需要与可能,守旧的结果更可能是稳定,更符合某些人文变化,并肯定能够免除“创”出漏子的灾害。

怕就怕在又创新又守旧的实践中,创出来的新并不到位,而守的旧家产又不足糊口与服人,那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,周瑜的实践证明,这种特色并非是不可能的。

轻视积累,轻视前人的研究成果,轻视资料与工具书的编撰,这是百余年来致命缺陷,造成无数成果的流失,无数精力的浪费。上上下下,大大小小,老老少少,人人都喊“创新”,都宣布自己“创新”了这,“创新”了那,其实有很多是无效劳动,是重复劳动,

是闭眼不看前人,不看他人,甚至连自己也不看,盲目性极大。正如杨振宁教授所言:

有些人不想去熟悉一个学科的基础,不想去熟悉前人已积累的知识,而想跳过这一步,迫不及待地向前跃进,想一下迎战最现代的问题。这样是绝不会成功的。你要反复学习人们过去研究的各种思想概念,当你把这些思想融会贯通之后,你会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東西。如果你还未熟悉前人的成就,要想跳到最前沿水平,做出真正的贡献是绝不可能的。(《杨振宁文录》320页,海南出版社,2002年)

思考是一种乐趣,是带有苦涩味道的乐趣。思考者要敏于学邃于思,思考者又往往是淡泊者。人不恬淡,不寡欲,思考就难以升华,难以超凡脱俗。人可以“追名”,也可以“逐利”,名与利绝不是什么坏东西。但追名逐利者往往不是思考者。少华甘于淡泊,故能思考,唯其能思考,故视野开阔,文字挺拔,淡泊家风,钟门骨气,跃然纸上。记得在一本书上读过这样一副对联,抄在这里,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:

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,
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。

2004年7月写于蓝旗营

目 录

序	何九盈(1)
---------	--------

中国近代新词语的产生与嬗变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研究中国近代新词语的意义及方法	(3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从马礼逊的《华英字典》看词语交流建设	(5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马礼逊的《华英字典》与《康熙字典》文化比较研究	(6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研究《四洲志》中引进新词的启示	(9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“语法”“文法”“文典”概念的近代阐述	(10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中国百年一词的嬗变	
-----------	--

——“百科全书”定义问题	(113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清末百科辞书条目特色研究	(127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主观—主体”及“客观—客体—对象”的中文嬗变	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

——兼致于光远先生	(165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试论民俗学科词语概念的近代阐述	(18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近代中华民族人文素质评估所用词语研究	(20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试论“知识”之定位问题	(245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试论近代中国之“国学”研究	(273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中国近代新词语的产生与嬗变

一、前 言

21 世纪的中国学术界,一方面庆幸百年来所积累的文化建设,已经可以基本站立了,无需再跟在别人后面爬行。但同时也有很尴尬的感受,那就是在各个学术圈之间和各个学术圈内,不同年龄层的同人难以有互相理解的专业语言,连同年龄层的人群之间进行讨论也像聋子间对话;同一个中文词语概念的内涵在不同的人那里有巨大区别,而原本不同的专业词语却偏偏是在力图说明着同一个概念。大小圈子内外的中文词语使用者迷惑了,但又无可奈何地像是看着、听着天书,同时还自己被动地使用着这些词语。原因何在?如果从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等外在环境找原因,是会找到许多自以为是的原因,但学术界可能又要重复近二十年来所养成的怪习惯,形成表面热闹的“争论”,归纳成种种形而上的“后思想”理论,又一次把自己民族所应该做的文化建设抛给“形而下”的书呆子。笔者经过多年思考与体验,觉得此困境并不难解决,用理论文字来表述,就是加强我们民族的工具思想和工具书建设,要强到查什么都能在工具书中找到公认的概念;而如果具体做,就是将我们民族的中文关键词语在近代约二百年间所产生的源头、所嬗变的主要痕迹,加以基本的排队清理,编成一部中国还缺乏的新类型的词语辞书,比如叫做《新辞源》就可以用了。

马礼逊(R. Morrison)在1822年编辑出版的《英华字典》,给予了笔者新的思考方向和启发。为了达到各民族词语能够在全世界人们中间自由准确交流的目的,外国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可贵的不懈的文化建设,一方面力图把握中文在世界中的文化作用,一方面努力把外国词语融进中文结构中。这等于打开一扇窗户:外国人可以通过窗户看见真实的中国,并进行将中国拉进全球化的活动;这扇窗同样给了中国人了解外国的工具。到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八十余年了(如果从明朝末年的利玛窦时期的对译开始计算则还要早得多),我们也该总结一下,至少问一下自己:这扇窗户我们利用得够不够?好不好?我们建设了足够好的新窗户做新工具了吗?我们对此窗户的了解够不够?外国人又利用得如何?他们的新窗户建设是什么样子?等等。这是我们民族必须要回答的问题,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。

每一个新词语在族群中产生并流通,自有其必然的理由和需要。《论语》或《诗经》得以从古代流传下来,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不需要再讨论的,每一个新加入族群的人都会通过学习其中的词语而获得知识。但如果没有新词语产生,那就意味着社会的停滞,人们思想交流的停滞。所以如果有人宣布可以用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,那就是愚民政策。而如果全部都是用新词语,屏弃旧词语,那同样还是愚民政策。换句话说,任何一个族群中出现外来的或自己产生的新词语,都是族群进步的标志。这些某一时期的新词语在旧词语环境中碰撞搅和,被接受的就融入适用语境中,难以被认同的就逐步淘汰出局。一个族群的语言就是这样发展进步的。中国作为几千年文明大国,语言的滚动积淀是十分明显的。我们只需要看从《说文解字》所开始形成的字词内容解释,到《康熙字典》集大成的注释,就都会承认中华民族的古代词语曾

经是世界上先进的语文体系。问题仅出在近代,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交融的过程中,所形成的新词语新概念多到现在也没有数清楚,甚至连传统字形、字音、字义都搞得中国人自己也常常认不得了。例如教了一辈子“国文”的启功先生,他自己就写道:“回忆起来,这五十年工作的绝大部分,都是把文言变成白话。当直接变不完全或不能恰当透彻时,从旁加上说明,不外乎口头的讲解、翻译和笔下的注释。这类工作中屡次遇到的困难,不外乎二项:一是名物和特殊的词汇,这比较好办,可以查书或向别人请教。二是语言的转译或解释,这不难在它们的用法,也不难在说明它们的性质,而难在使听者直觉地懂得。”^[1]

近代开始企图帮助解决这个难题的语言工具书,约略有 250 部以上,如果合在一起,能够说已经基本解决此难题了吗?回答只能是否定的。因为我们只需以其中最接近此目标的《辞源》为例,就可以明白了。商务印书馆的同人经过八年的努力,在 1915 年编撰出版《辞源》第一版,编辑主任陆尔奎先生在前言中就指明了他们的思想:“国无辞书,无文化可言。”他们更是艰辛地体验到:“一辞见于此类,又见于彼类;或各为系统,两不相蒙;或数义并呈,而同出一母。至此欲别其同异,观其会通,遂涉考订蹊径,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,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,甚至驰书万里,博访通人,其或得或失,亦难预料,穷搜冥索,所用以自劳者。惟流分派别,忽逢其源,则豁然尽解,理得而心安。始知沿流以溯源,不如由源以竟委。虽吾国古籍半多散逸,唐宋以来所发生之名辞,不能尽知其依据,然知识浅短,失之目前,亦所在皆是。同人以此自励,源之一字,遂日在心目。”^[2]显然他们早已经看到问题症结所在,并且尽了最大力量,《辞源》也因此被中外学人使用至今。但是他们的缺点也是明显的,一是当时的新词语很

多没有编进去,而编进去的新词语源头他们介绍得太简单,甚至远不如同时的其他一些辞书;二是即使有了词语源头出处,缺乏词语概念后来的嬗变,困难依然存在,空白依然是空白,因为源头的词语概念与近现代的同形词语的概念,往往并不一定是一个意思,往往会引申出不同的诠释。而最基本的诠释近代词语嬗变的工具书,在 20 世纪的中国还很少出现。

至于探求近代新词语源头的方法原则,启功先生其实也早有明示:“寻根之法,我想如果从字典、辞书包括《经传释词》《经籍纂诂》《辞通》《辞源》等书中,把常见常用的字词选出来,再把每个字词的‘义项’用寻找公约数、公倍数的办法加以处理。先用一个‘意’去‘约’这个字词的全部‘义项’,可以穿得起的,便可以得出一个‘义’。……如果这样做到了,总比‘单打一’的注释要简单得多。读者不但得知其当然,还能得知其所以然。”^[3]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通用于中文古词语概念的整理,也同样可以用于中文近代新词语概念的整理。为了能够让今天的读者得知其所以然,把近代中文辞书集合起来是必要的第一步,然后再由专业人士按照规范要求整理,总会比 90 年前的《辞源》整理得好吧?

本文所讲的“近代新词语”概念,是以近代中文辞书中出现的条目为重点介绍对象的,而基本不考虑近代风云人物偶然使用这些词语的说法。这并非贬低近代名人在历史文化中的作用,而是为了更清楚、更准确地表述。笔者有理由如下:(一)中文近代辞书的公允性:相对而言,辞书条目的编撰原则之一,就是要注意公允性,就是让近代读者能够获得科学、准确、无政治偏颇、充分照顾各方面读者的概念。我们研究近代新词语,就应该以公允性为基本要求。尽管近代几百部辞书的条目内涵并不令近现代人全满意,缺漏与差错不少,但比较起同时代的各专业书籍内涵,似乎